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十七



佛道与阴阳： 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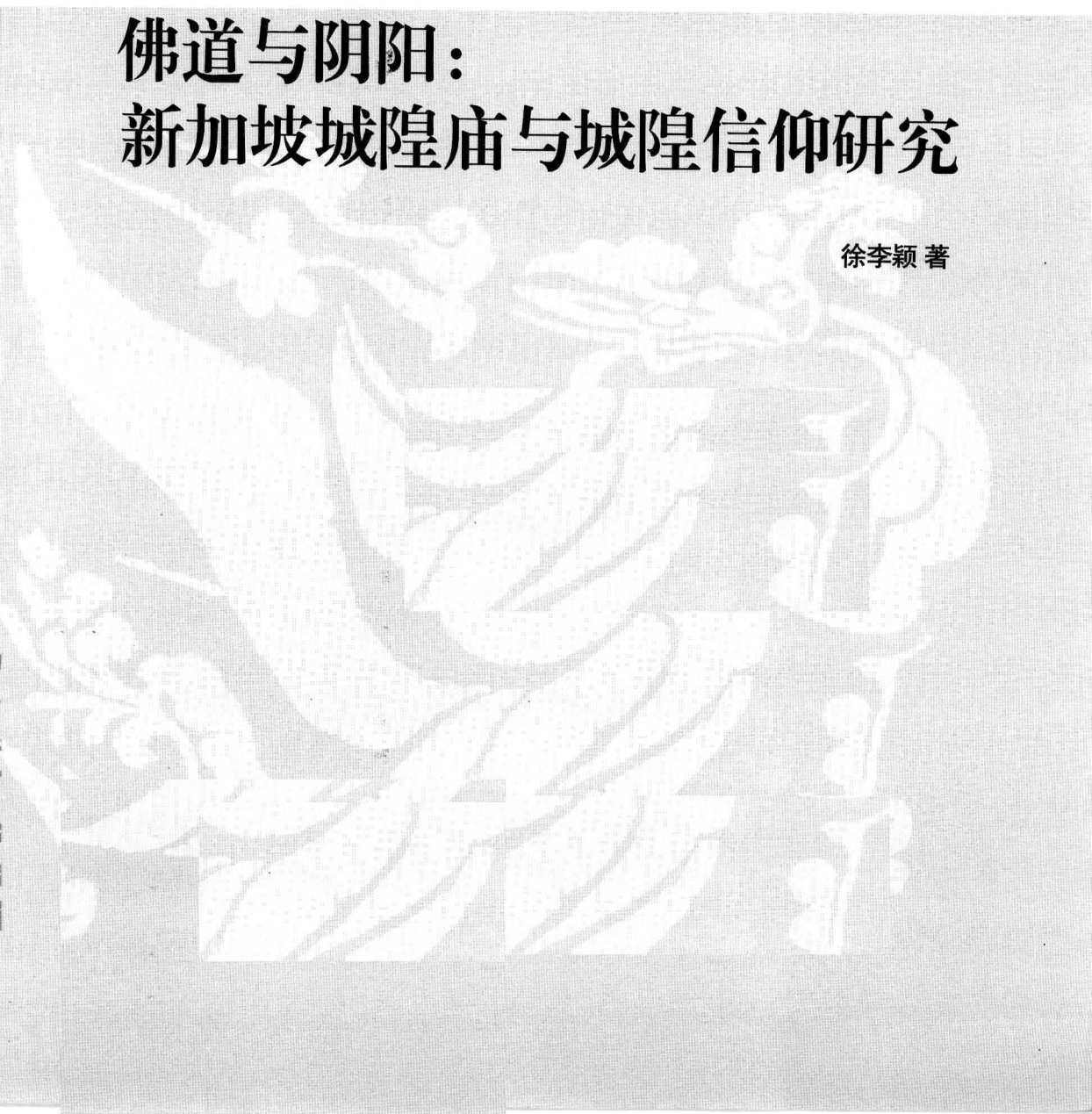
徐李颖 著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十七

佛道与阴阳： 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

徐李颖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徐李颖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3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ISBN 978-7-5615-3470-0

I. 佛… II. 徐… III. ①城隍-寺庙-研究-新加坡②城隍-信仰-研究-新加坡
IV. B957.339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1627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 插页:2

字数:320千字 印数:1~2000册

定价:3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出版例言

一、为了促进我国国学研究的繁荣，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出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旨在鼓励海内外学者在国学领域的深入探索和研究。

一、本丛书的资助出版范围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章程为依据，围绕着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产生划时代影响的朱熹理学这一核心，进而探索唐宋以来中国南方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民生经济、宗教习俗等各领域的演变发展，以及深入研究在朱熹与闽学影响下的闽台及周边区域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尤其注重对东南海洋带文化传承的探讨，对中国文化在这些区域的演进，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努力建构国学研究的东南风格。

一、本丛书面向国际性、专门性研究的学术著作，本着百家争鸣、求同存异的原则，增进不同区域间的学术交流互动与中华文化认同。不同区域的学者各自遵循的学术规范和表述方式必然有所差异和区别，从充分尊重学术交往的立场出发，出版时尽量做到保持原著的面貌，原则上不做过多的更改与硬性的统一，相信读者能够正确地给予甄别和分辨。

一、本丛书采用中文简体字出版，允许对书稿进行合乎丛书体例的调适和出版技术规范的处理。惟征引典籍的个别异体字、通假字以及习用专有名称等姑仍其旧；遇有错讹字予以订正，正字置于方括弧[]内。另须特别说明者，使用[编者按]予以注明。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新加坡华人社会与民间信仰	(13)
第一节 新加坡的早期华人移民	(14)
第二节 帮权社会与帮权庙宇	(16)
第三节 社会阶层与民间信仰	(20)
第四节 国家意识的转变与庙宇	(21)
第五节 新加坡宗教政策与庙宇发展	(24)
第六节 新加坡华人民间信仰的特征与趋势	(29)
第三章 城隍信仰中的阴阳与佛道属性	(36)
第一节 城隍缘起：“水庸”非“城隍”	(36)
第二节 城隍职能的发展：从保佑城池到燮理阴阳	(39)
第三节 城隍信仰的制度化过程	(45)
第四节 城隍信仰与佛道二教的关系	(51)
第四章 佛道之间：新加坡城隍信仰与城隍庙发展模式	(59)
第一节 新加坡城隍神在庙宇中的奉祀格局	(60)
第二节 由僧到俗：都城隍庙(含东岳庙)	(64)
第三节 佛道并峙：双林城隍庙	(86)
第四节 由俗入道：韭菜芭城隍庙和杨桃园城隍庙	(93)
第五节 佛教化与道教化——民间庙宇向制度型宗教转型	(114)

第五章 阴阳之间:城隍庙与仪式	(116)
第一节 庙宇与仪式之一: 佛教化城隍庙——调和阴间秩序.....	(117)
第二节 庙宇与仪式之二: 道教化城隍庙——求取阳间现世利益.....	(150)
第三节 与城隍有关的其他信仰形态: 阴司殿与大、二爷伯	(184)
第四节 新加坡城隍信仰与幽明观念.....	(190)
第六章 信仰网络与宗教权威的建立:道教化城隍庙典型个案研究.....	(196)
第一节 跨国性的城隍信仰网络:从新加坡到安溪	(196)
第二节 宗教权威的建立:从城隍庙到道教总会	(222)
第三节 社会功能的扩展:慈善与商业	(248)
第四节 从宗教权威到制度型道教的建立.....	(254)
第七章 结论与思考:新加坡民间信仰的“理性化进程”	(257)
参考文献.....	(264)
后 记.....	(279)

第一章

绪 论

新加坡的华人民间信仰丰富多彩,城隍作为具有影响力的神明之一,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新加坡民间信仰的切入点。首先,在这里将新加坡民间信仰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回顾。

一、新加坡民间信仰的研究回顾

作为新加坡华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城隍信仰的研究是与整个新加坡华人民间信仰息息相关的。因此,本书也对新加坡民间信仰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的回顾。

新加坡华人的“移民”与“移神”历史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早期的民间信仰活动较少见于文献资料,这就给新、马华人民间信仰的历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庆幸的是,在殖民地时代,一些殖民地官员根据自身的所观所感留下了不少关于海峡殖民地华人社会的著作,如 J. D. Vaughan 于 1879 年所写的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①(澳恩《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习惯》),叙述了 19 世纪新加坡和檳城华人的生活状况,其中一部分专门论述新加坡的华人庙宇。还有维多·巴素博士(Victor Purcell)所著的《马来亚华侨史》②,是他根据自己在马来亚担任官员时所搜集的材料而写成的。其中一章以檳榔屿为例,详细描述了当时华人信仰的种种习俗和特征。

除了殖民地官员,游历过新加坡的清朝人李钟珏根据自己的见闻于 1895

① 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79; With an introd. by Wilfred Blyth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② 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檳榔屿: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40 年。

年写成《新加坡风土记》^①一书,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描述当时新加坡的风土人情。而成书于1922年的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②则是从一个新加坡土生华人的角度来记叙新加坡的历史,初衷是为了纪念1919年新加坡开埠一百周年,所用的是报章资料,采用编年体的记叙方式,其中对华人的神明和信仰也有描述。

原清华大学教授陈达所撰《南洋华侨和闽粤社会》出版于1938年,所研究的是闽粤地区的侨乡的社会状况。是最早一部用社会学的调查访问的方法研究华侨与祖籍地的专著。最后一章专门写闽粤华侨祖籍地的信仰。利用了很多口述资料和实地调查的统计资料,对于研究南洋华人对祖籍地社会生活的影响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加坡本地的文化工作者开始撰写一些介绍当地庙宇的著作,如谢鸣非的《新加坡庙宇概览》^③。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也来到东南亚地区从事华人社会的研究,尽管从主观上看他们是把东南亚地区作为研究中国的实验室,试图通过东南亚华人来了解中国文化,但从客观上却推动了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人文化的认识。英国人类学家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傅利曼于1949年到1950年在新加坡从事人类学调查,写成《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④(*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一书。当时新加坡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着战后重建、争取独立、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者对华人社会的调查反映了这一时期华人家庭和婚姻的形态,进而探讨中国文明在殖民地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作者是以亲属组织为论述核心,但他所记录下的婚葬仪式、节日风俗等等已经涉及了华人的宗教信仰问题。

对新加坡华人宗教信仰研究有重要贡献的是Marjorie Topley。她尤其

① [清]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许云樵注译,新加坡:南洋编译所,1947年。

②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Malaya Press, 1967.

③ 谢鸣非:《新加坡庙宇概览》,新加坡:南风商业出版社,1951年。

④ 傅利曼:《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郭振羽、罗伊菲译,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

对广东籍人士的斋堂^①、冥婚^②及信仰观念^③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广东籍人对于“灵魂”的信仰特别强烈。^④她也是较早开始研究新加坡“冥婚”的学者,她对于新加坡广东人冥婚的叙述和分析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

曾经担任过殖民地官员的 Leon Comber,出于对华人风俗的兴趣,写成 *Chinese Temples in Singapore*^⑤ 一书,这是介绍新加坡华人庙宇的一本小册子,为西方人、游客,以及只会英文的华人所写。作者亲自走访了这些庙宇,尽量详细地记录下这些庙宇的位置、神明、庆典、管理者等。

此外新加坡的“乩童”也特别受到西方人类学家的关注。Alan Elliott 曾就新加坡神庙及各类乩童的来历,调查及访问了 100 位信徒和 17 位乩童。他指出乩童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国家政策及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影响,Alan 认为乩童和学坐乩的信仰将趋向没落。^⑥不过 Freedman 与 Topley 则持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民间宗教在新加坡具有商业上的价值,所以乩童是不会消失的。^⑦

20 世纪 70—80 年代,新加坡出现了一批研究华人社会的本土学者,他们既有从事文化工作的背景,又对华人社会深有了解,如林孝胜、柯木林、崔贵

① Marjorie Topley, "Chinese Woman's Vegetarians House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6, 1954.

② Marjorie Topley, "Ghost Marriages among the Singapore Chinese," *Man*, Vol. 55, 1955; "Ghost Marriages among the Singapore Chinese: A Further Note," *Man*, Vol. 56, 1956, pp. 71~72.

③ Marjorie Topley, "Chinese Religion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9, 1956; "The Great Way of Former Heaven: A Chinese Semi-Secret Religion in Malaya," *The New Malayan*, Singapore, 1957; "The Emergence and Social Function of Chinese Religious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 No. 3, 1961.

④ Marjorie Topley, "Some Occasional Rites Performed by the Singapore Cantones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4, 1951; "Chinese Rites for the Repose of the Soul: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antonese Custom,"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7, 1952.

⑤ Leon Comber, *Chinese Templ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⑥ Alan Elliott, *Chinese Spirit-Medium Cults in Singapor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5.

⑦ Maurice Freedman and Marjorie Topley, "Religion and Social Realignment among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1, No. 1, 1961.

强、陈育菘等等。无论是对新加坡华人民间信仰的社会调查还是与其他宗教的比较分析，这些学者们对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70年代，新加坡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的改造和建设，很多庙宇、会馆、宗祠都面临着拆迁或迁移的命运。为挽救这些建筑中保存的华文碑刻资料，陈荆和、陈育菘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对散落在各庙宇、会馆、公冢的碑铭进行搜集、整理，并出版了《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①。该书共分为庙宇、会馆、公冢、宗祠、书院、医院、墓志铭附题赞、教会、纪念碑(杂)共九大类，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提供了全面的碑刻资料。

以林孝胜为首编写的《石叻古迹》^②算是调查新加坡华人民间庙宇的一部标志性著作。该书出版于1975年，他们选择了新加坡古迹当中较有历史价值的庙宇、会馆等，进行了田野调查，写出了26篇相关文章。

关于新加坡庙宇的概论性著作是丘新民于1982年撰写的《新加坡宗教文化》^③，涉及新加坡的各种宗教，其中华人的宗教占了很大的比例。文中不仅有对新加坡华人宗教的概述，还有华人庙宇、神明的统计分析。

对华人史深有研究的颜清滢^④教授，也特别重视华人信仰的社会意义，他在一些重要著作里都提及了华人庙宇的情况，如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⑤（《新马华人社会史》）一书就讲到了华社的宗教和风俗。早期华人社会会馆、庙宇、学校合而为一，庙宇在宗教功能之外还承担了其他各种社会职能，在华人社会史中，庙宇的研究是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其他宗教信仰者为了传教的需要也对华人信仰进行研究，陈润棠的博士

① 陈荆和、陈育菘：《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

② 林孝胜等：《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1975年。

③ 丘新民：《新加坡宗教文化》，新加坡：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出版部，1982年。

④ 颜清滢，1937年生于福建永春县石彭乡，现为澳大利亚公民。1956年毕业于吉隆坡尊孔中学。1960年获南洋大学文学学士。1963年8月受聘回南洋大学历史系任助教。1965年进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论文为：*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Malaya (1900—1911)*。该论文后由李恩涵译成中文《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1970年毕业后受聘为南澳阿德雷德大学讲师，后晋升为教授。1989年至1990年出任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1991年重返阿德雷德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现执教于阿德雷德大学。主讲《亚洲政治》和《亚洲华人商业》。

⑤ Yan Qinghua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论文《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①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该书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以批判的口吻来描述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虽然论述中言辞过于偏颇,但可帮助我们了解异宗教之间的碰撞。

1980年,新加坡政府做了一次人口普查,该次普查也包括了对宗教信仰的统计,与华人有关的信仰都被归入了佛教或者道教两类。郭振羽针对这次统计完成了一份关于宗教信仰的统计报告书:*Religion in Singapore: An Analysis of the 1980 Census Data*^②。在这份报告书里,郭振羽指出新加坡华人宗教信仰意识中的“佛教”和“道教”类别的界定颇为含糊。因此建议将普查中34.3%佛教徒与38.2%道教徒条项合二为一,使构成数量颇为可观的72.5%之“佛/道教”类。这一提法其实已经涉及对华人民间信仰的界定的问题,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地思考有关华人民间信仰与制度型宗教之间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新加坡民间信仰的研究有日渐繁荣的趋势,一方面因为当地华人庙宇开始重视编写并出版自己的庙刊,为民间信仰的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料;另一方面受到西方“自下而上”的学术思潮的影响,更多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通过广泛的调查来研究新、马华民间信仰自身的发展特性。如刘丽芳、麦留芳《曼谷与新加坡华人庙宇及宗教习俗的调查》^③通过对曼谷和新加坡华人庙宇和习俗的调查对两地的华人信仰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是一份比较详尽的调查报告。

陈志明曾对东南亚华人信仰的研究情况做了总结,尤其对“华人宗教”、“华人信仰”概念的讨论、神明和庙宇的研究、华人佛教的研究等作了归类和分析。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陈志明指出,华人宗教信仰是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力量,除了要研究华人民间信仰本身,宗教与认同、宗教与华商、华人的多神信仰等都是研究中要特别重视的地方。华人宗教信仰的发展也与整个社会大背景有密切的关系。^④

在民间教团的研究方面,陈志明通过田野和文献的结合,考察了新、马最

① 陈润棠:《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香港:基道书楼,1989年。

② Eddie C. Y. Kuo, *Religion in Singapore: An Analysis of the 1980 Census Data*, Singapore: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1989.

③ 刘丽芳、麦留芳:《曼谷与新加坡华人庙宇及宗教习俗的调查》,《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第九辑》,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4年。

④ Tan Chee Beng,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in Southeast Asia: Some Views,"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edited by Leo Suryadinat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pp. 139~165.

大的民间教团——德教会^①，认为德教会是一种融合性宗教。作者把没有组织的华人宗教信仰和仪式统称为“华人宗教”，德教会就属于华人宗教中的一种教派。通过对德教会的研究，陈志明也试图说明宗教的理性化过程。

此外，曾玲、庄英章从祖先崇拜和社群整合的角度对新加坡的坟山组织的研究^②、林纬毅对于新加坡联合宫和玄天上帝的研究^③、李志贤对新加坡潮人善堂的研究^④等等都丰富和扩展了新加坡华人民间信仰的研究内容与范围。

中国大陆学者对华人社会的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也日趋增多，但关注点侧重于经济和政治层面。^⑤ 曾玲对新加坡华人坟山的研究开始打破这种局限。她尤其重视新加坡的帮群问题，试图通过坟山、祖先崇拜、会馆等的研究来扩大对帮群的认识。^⑥ 2005 年，由曾玲整理的一批有关新加坡福德祠绿

① 陈志明：《马新德教会之发展及其分布研究》，苏庆华译，台北：代理员文摘（马）有限公司，1991 年。

② 曾玲、庄英章：《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 年。

③ 林纬毅：《社会变迁与乡间民间信仰的整合：以淡滨尼联合宫为例》，见林纬毅主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 年。林纬毅：《从粤海清庙的文物看新加坡潮人对玄天上帝的信仰》，见李志贤主编：《海外潮人的移民经验》，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2003 年。

④ 李志贤：《宗教仪式、文化认同、商业网络：新加坡潮人善堂信仰与社群的多层面互动》，见林纬毅主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 年。

⑤ 相关研究有：袁丁：《持续和变迁：人口统计中反映的新加坡华人宗教信仰的变化》，《世界民族》2000 年第 3 期；张禹东：《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世界宗教研究》2005 年第 1 期；张禹东：《马来西亚的华人宗教文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张禹东：《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考》，《华侨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张禹东：《华侨华人传统宗教及其现代转化》，《华侨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李天锡：《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年；李天锡：《福建民间信仰在新加坡的传播》，《八桂侨史》1998 年第 1 期；高伟浓：《东南亚华人信仰诸神考说》，泰国：泰国大通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⑥ 曾玲：《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文史哲》2006 年第 1 期；《阴阳之间——新加坡华人祖先崇拜的田野调查》，《世界宗教研究》2003 年第 2 期；《“虚拟”先人与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兼论海外华人的亲属概念》，《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新加坡华人的龙牌崇拜初探——兼与祖先崇拜比较》，《厦门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坟山组织、社群共祖与帮群整合——十九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亚洲文化》2000 年总第 24 期。

野亭的资料出版^①,共计四册,包括会议记录、账本、碑铭等,另有一本《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②。这批珍贵文献的出版为新加坡的帮权坟山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新加坡华人供奉的神明丰富多彩,但奉祀较为普遍的大伯公、妈祖等仍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关楚朴^③、韩槐准^④、许云樵^⑤、陈育崧^⑥、饶宗颐^⑦、天官赐^⑧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大伯公的来历作了考证。黄尧^⑨、张少宽^⑩、陈志明^⑪则从大伯公与拿督公、土地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郑志明^⑫从客家社会的大伯公信仰入手,认为大伯公信仰是族群融合重要的文化指针,其发展的趋势值得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妈祖是最早来到新加坡的华人神明之一。早在1941年,韩槐准就在《南洋学报》发表了《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⑬一文,着重论述了妈祖信仰与当时南来华侨的关系。1950年,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朱杰勤也在《南洋学报》发表了

① 曾玲主编:《福德祠绿野亭文献一:1920—1927年会议记录汇编》;《福德祠绿野亭文献之二:1.1953—1959年会议记录汇编、2.绿野亭坟山迁葬委员会决议,1957—1959》;《福德祠绿野亭文献之三:1887—1933年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新加坡: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

② 曾玲:《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新加坡: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

③ 关楚朴:《谈谈大伯公》,《星洲日报半月刊》1939年第2期。

④ 韩槐准:《大伯公考》,《南洋学报》1940年第1卷第2期。

⑤ 许云樵:《大伯公、二伯公与本头公》,《南洋学报》1951年第7卷第2期;许云樵:《再谈大伯公研究》,《南洋学报》1952年第8卷第2期;许云樵:《大伯公为吴太伯说的由来》,《南洋学报》1956年第12卷第2期。

⑥ 陈育崧:《Tokong考》,《南洋学报》1951年第7卷第2期。

⑦ 饶宗颐:《谈伯公》,《南洋学报》1952年第8卷第2期。

⑧ 天官赐:《大伯公是何方神圣》,《南洋文摘》1963年第4卷第1期。

⑨ 黄尧:《三位一体的神:大伯公、拿督公、土地公》,《文道月刊》1981年第13期。

⑩ 张少宽:《大伯公、拿督公与土地公关系的商榷》,《文道月刊》1982年第16期。

⑪ 陈志明:《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特论马来西亚的大伯公》,《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0年。

⑫ 郑志明:《客家社会大伯公信仰在东南亚的发展》,《华侨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⑬ 韩槐准:《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南洋学报》1941年第2卷第2期。

考证性的文章《福建水神天妃考》^①。马来西亚的苏庆华对妈祖做过多重研究。^②此外,张克润^③、张珣^④、赖世昭^⑤等都对新加坡的妈祖信仰作了描述。林纬毅《万世顺公司与新加坡潮人的妈祖祭祀》^⑥则从帮权的角度分析了潮州人的妈祖信仰。

新加坡的城隍信仰研究不多,但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⑦、《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习惯》^⑧、《新加坡华人庙宇》^⑨、《石叻古迹》^⑩等书里还是能找到一些记载。笔者的硕士论文《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的宗教文化:庙宇与庙会》^⑪是对新加坡城隍庙的个案研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华人民间信仰研究可分为如下三类:一类是关注华人信仰自身的变化,对庙宇和神明作具体的考证与分析;第二类是以西方学者和一些曾在西方留学的人类学家为代表,他们更侧重于对华人宗教和民间信仰进行人类学解读,通过对仪式的分析来解释华人的信仰心理;另一类则是通过庙宇来研究华人社会内部方言群与帮权的问题,注重的是华人社

① 朱杰勤:《福建水神天妃考》,《南洋学报》1950年第6卷第1期。

② Soo Khin Wah, A Study of the Cult of Mazu in Peninsular Malaysia.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1987; Soo Khin Wah, "The Cult of Mazu in Peninsular Malaysia,"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 No. 9, 1990, pp. 29~30. 苏庆华:《从妈祖崇祀到妈祖文化研究——以马、新两国为例》,《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2004年。

③ 张克润:《新加坡妈祖源考研究》,《源》1993年第1期。

④ 张珣:《星州与台湾妈祖信仰初步比较》,《妈祖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财团法人北港朝天宫董事会、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

⑤ 赖世昭:《新加坡华人的天后信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学位论文,1995年。

⑥ 林纬毅:《万世顺公司与新加坡潮人的妈祖祭祀》,《百年回眸——新马华人社会一百年的变迁》,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2005年。

⑦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Malaya Press, 1967.

⑧ 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79.

⑨ Leon Comber, *Chinese Templ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⑩ 林孝胜等:《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1975年。

⑪ 徐李颖:《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的宗教文化:庙宇与庙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3年。

会内部的权力运作与斗争。除了以上三类,笔者认为,新加坡华人的民间信仰还有广阔的研究余地,尤其在信仰变异与国家变迁的互动、信仰网络的建立、信仰与仪式的文化研究,以及当代社会中民间庙宇的社会功能等等。

但是,新加坡华人的民间信仰早期大多缺乏文字记载。除了与会馆关系密切的几间庙宇有史可考证外,大部分都是在民间自生自灭。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才有学者开始考证华人庙宇的历史及发展状况。文献资料的缺乏决定了本书对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倚重。因此,本书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有: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会议记录与来往信函;庙宇出版物(纪念特刊、会员名录、会讯等等);个人文集与新闻报章(个人文集主要是《瑞于上人诗集》;报章包括《叻报》、《联合早报》、《新民日报》)。

二、关于“民间信仰”

本书所研究的城隍信仰属于华人民间信仰的范畴,但是关于“民间信仰”的定义,学术界有诸多分歧。在此先对本书所使用的“民间信仰”的概念进行厘定。

“民间信仰”或称“大众宗教”(popular religion),从广义上来说,是指华人生活中一般大众所具有的信仰;从狭义上来说,则是与“官方信仰”或“制度型宗教”相对的概念。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指出,非西方的文明社会既不同于西方社会,也不同于非洲等地的部落社会,非西方的文明社会可以称之为“乡民社会”(peasant societies),他将“乡民社会”的文化分为以都市为中心的上层“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广布于城乡之外的乡间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①。很多学者利用这一理论将中国的民间宗教归入“小传统”之列。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大、小传统的二分法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社会复杂的信仰状况。于是杨庆堃(C. K. Yang)试图从中国宗教的功能性来区分。

杨庆堃认为,从中国宗教的结构功能上看,有两种类型:制度型(institutional)与扩散型(diffused religion)^②。所谓“制度型”是指佛教、道教等有完

^①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② C. K. Yang, *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y*,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 20.

整宗教制度、宗教规范的宗教,拥有神学或宇宙和人事的解释系统,拥有独特的象征和崇拜仪式,并独立于其他世俗建制的宗教。制度型宗教的最大特点是可以独立于世俗的社会体系之外,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世俗社会相分离。而“扩散型”则是渗透在人们生活中的信仰形态,没有完整明确的组织教义,但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岁时祭祀、生命礼仪等等。这一划分因为最为贴近中国宗教文化特性而受到广泛的应用,也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制度型”、“组织型”、“扩散型”(或普化型、综摄型)。如台湾学者王见川的观点:“基本上我将民间信仰分为‘民间信仰’及‘民间宗教’(或称民间教派)两部分,这和‘既成宗教’有很大的区别。所谓‘既成宗教’是指制度化或正统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回教等。而‘民间信仰’就像一贯道、慈惠堂(二者是战后台湾本土最具实力的教派),含有既成宗教的某些基本成分,例如明确的教义、教主、经典、执事等,但却不被官方承认,只能在民间求生存。”^①

韦思谛(Stephen C. Averill)在《中国大众宗教》一书的序言中,总结和反思了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大众宗教”(popular religion,又译为“民间宗教”)所作的定义。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蒂芬·泰瑟(Stephen Teiser)提出的,他认为“大众宗教”构成了“几乎所有中国人信奉的宗教形式,而不用考虑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或特定的宗教取向。大众宗教首先是超越了所有社会界线的所有人共同信奉的宗教”。韦思谛认为按照这种定义,丧俗的许多内容或是与春节有关的活动都可以当作是大众宗教的例证。不过,因为就这一点而言大众宗教是一个大类,它是这样趋于静态且不受时间影响,也就使得它忽略了时间和空间潜在的重要变化,掩饰了群体间的冲突。^②这一术语的第二种定义,“大众宗教”指的是与精英层相对的下层阶级的宗教。考虑到宗教受社会地位影响,就使得学者们要以比较细致的方法来区分参加同一宗教活动的不同参加者。比如来自各种社会阶层的人会参加当地的庙会或是其他类似活动,但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对他们的活动和动机就会有不同的说法。以这种方式考虑大众宗教就与西方学界注重研究“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大趋势非常吻合,“自下而上”的历史强调普通人而不是上层人物的生活和思想,许多学者现在都倾向于采用“大众宗教”的这一定义。然而这种定义也有

^① 王见川:《台湾民间信仰的研究与调查——以史料、研究者为考察中心》,张珣、江灿腾合编《当代台湾宗教研究导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② 韦思谛著,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序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自己的问题。比如在中国尤其是过去,大多数人都不识字,而留存下来的历史材料都是由有文化的上层人物写的,所以要想复原普通人原始的看法就非常困难。^①

根据韦思谛的分析,无论是用大众宗教一词涵盖中国人的所有信仰,还是仅仅用它表述下层民众的信仰,都有其缺陷。这一点在研究海外华人民间信仰上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随着底层移民的流动被带入到新马一带后,已经和其他的神祇崇拜、自然崇拜、祖先祭祀等内容杂糅在了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就是说无论是制度化的宗教,还是乡民阶层的信仰,在移民社会初期都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局面,而且这种整合都是在民间自动自发地完成的,并没有统治阶层直接干预。

新马当地的学者,如陈志明等建议用“华人宗教”作为华人信仰体系的标签^②。如苏庆华所言,“‘华人宗教’一般解释为‘华人普遍信仰的宗教’,这种界说,听起来十分笼统,却又蕴含着一定程度的道理。原因是:除了少数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纯正佛教者之外,一般华人即礼佛又拜神,且祭祀祖先,崇拜自然神祇、庶务精灵等,内容十分糅杂。”^③

以“华人宗教”来统摄华人的信仰体系,有一定的道理统。但却没有区分个人信仰和庙宇集体活动之间的差别。

新加坡在建国后,不少庙宇被迫择地重建,为顺利与政府沟通,以及申请重建的法律手续,原本私人掌管的庙宇纷纷注册为社团。从“私人庙宇”到“社团庙宇”,这一形式上的变化是影响深远的。社团庙宇必须符合社团法令,通过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会章程要符合社团法令,理事会的活动受到政府的监督等等。社团性庙宇的出现,使得私人庙宇的随意性、家族性逐渐减弱,而理事会的公共意志被强调。尽管社团庙宇也存在着理事会不团结的弊端,但从总体上而言,社团庙宇的发展更为强调庙宇本身的利益,而非主管者的个人利益,再加上国家对慈善事业的倡导,社团庙宇在社区服务、慈善活动中逐渐展露实力。

因此,本书主张以“华人宗教信仰”来取代“华人宗教”的内涵。作为统称,

^① 韦思谛著,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序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② Tan Chee Beng, “Chinese Religion in Malasia: A General View,” *Asian Folklore Studies* 42(2), 1983, pp. 233~234.

^③ 苏庆华:《马来西亚华人宗教史概述》,《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2004年。